

读 书 阅 世 丛 书

主 编 吴小如 谢蔚明

半拙斋古今谈

唐振常 著

山 西 教 育 出 版 社

读书阅世丛书
半拙斋古今谈

唐振常 著

*

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（太原并州北路69号）

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8.625 字数：227千字

1998年6月第1版 1998年6月山西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000册

*

ISBN 7-5440-1420-7
Z·7 定价：9.20元



陈寅恪先生在《元白诗笺证稿》中有论曰：“值此道德标准、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，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，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，而其贤者拙者，常感受痛苦，终于消灭而后已。”取此与先生《王观堂先生挽词·序》并读，当知先生之意，在勉知识分子当此际会应效贤而拙者之所为。秉先生之训，乃命所居曰拙斋。然自读书以来，寒舍实无书斋，读书为文皆在卧室，而此卧室之中又确实堆放了一部分书，便杜撰一词曰半拙斋，意卧室之半是读书为文之处，而非只效“拙”之一半也。集中所谈，有古有今，乃命此集为《半拙斋古今谈》。

编这本集子，所花时间最长，到重写这篇序文的今天，历时共达一年。起初没有了解清楚出版社的意图，收文过泛，列类达九，字数过多，后商之于主编者吴小如、谢蔚明二人，去掉了《记游》、《品食》二类。又后来，复蒙孙钊先生、梁平女士告知，才知不收学术论文，早年几篇谈艺之作，时代痕迹甚重，建议删去。我以为他们的意见很好，便又抽去了这两类稿件，原列的“寿人”一类，以篇数过少，我也一并删去了。重加整理，在留存的四个篇类中，删去多篇文字，增入新作及旧作之未曾入集者十一篇，便成了现在的四篇类五十文，其类别为：《读书篇》、《识史篇》、《怀逝篇》及《叙文篇》。

所谓“识史”，亦本陈寅恪先生“在历史中求史识”之教，但非敢言已得史识，乃是读而识（志）之，从“不贤者识小”之意云尔。“叙文”，即为他人之作所写的序文的意思。其中，熊佛

西前辈的《山水人物印象记》，出书计划已废，为了提醒学界勿忘此老，亦予收入。史学前辈黎东方先生存我国讲史之古体，写作《细说》各朝历史之著作多部，享盛誉于台湾及海外，承命勉力为序，得与九十余高龄的黎先生结识，所憾者，至今不知黎先生这几部大作的大陆版何时方得与读者见面。

张紫葛的一部伪书《心香泪酒祭吴宓》，不只厚诬吴宓先生，亦复欺世太甚，其书竟得以流行，盖由世人不明真相。驳论方兴，中道而废。我这篇新作《君子可欺以其方，难罔以非其道》收入集中，实在说，不免带有几分悲哀。然孟子万章谈及子产而发此言，其理则是千古不泯。

1997年8月8日

61
38

目 录

读 书 篇

君子可欺以其方 难罔以非其道——论张紫葛《心香 泪酒祭吴宓》之诬	〔 3 〕
卓荦孤怀身殉道——《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》读后	〔 21 〕
孤怀卓荦殉道真——《吴宓自编年谱》读后	〔 27 〕
道高犹许后生闻——吴宓先生之乐道敬业精神	〔 33 〕
谈陈寅恪先生治史	〔 39 〕
纵贯横通论晚清——石泉《甲午战前三十年间晚清政局 概观》书后	〔 45 〕
访古讲史 各得其宜	〔 50 〕

识 史 篇

曾·左·李	〔 55 〕
李二先生非汉奸	〔 60 〕
再说李鸿章	〔 64 〕
张之洞巧宦热中	〔 70 〕
清末三屠	〔 75 〕

刘公岛上念甲午	〔 81 〕
春帆楼屈辱依在	〔 85 〕
东南互保幕后策划	〔 88 〕
赵凤昌假造圣旨	〔 91 〕
赫德与《辛丑条约》	〔 93 〕
寿则多辱	〔 97 〕
“无大臣之风”	〔 103 〕
也说吴稚晖	〔 106 〕
“我们在割稻子”	〔 110 〕
关于《大公报》二事	〔 114 〕
胡适一事	〔 116 〕
一个词语搅乱了历史	〔 118 〕
广重塑上海城市形象论	〔 120 〕
也谈清官	〔 127 〕
忆故居	〔 130 〕
所遇胡适门下一人	〔 137 〕
香港缘	〔 139 〕

怀 逝 篇

赵尧生先生手札书后	〔 147 〕
周孝怀先生	〔 162 〕
忆舅父——记一代经学大师龚向农先生	〔 166 〕
重读《柳如是别传》忆陈寅恪先生	〔 175 〕
想起了吴雨僧先生	〔 187 〕
周太玄“法师”杂忆	〔 192 〕
张东荪先生记微	〔 198 〕

漫记萧公权先生	〔 202 〕
记叶圣陶先生	〔 210 〕
文章报国难——纪念王芸生先生九五冥诞	〔 214 〕
悼李公纯青	〔 220 〕
漫说陈虞老	〔 225 〕
忆江村	〔 236 〕

叙 文 篇

黎东方先生讲史之学	〔 241 〕
熊佛西先生及其《山水人物印象记》	〔 246 〕
《中国文化之谜》第四辑序	〔 252 〕
独辟蹊径创新境——序《乡土童年——回忆消逝的中 国传统》	〔 259 〕
《上海工运志》序	〔 261 〕
《龙华镇志》序	〔 263 〕
中华文化最关情——《明报》纽约版创刊志贺	〔 265 〕
《黎澍之路》后记	〔 267 〕

读书篇

君子可欺以其方 难罔以非其道

——论张紫葛《心香泪酒祭吴宓》之诬

自陆键东《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》出，世人更知陈先生之孤怀卓犖、高风亮节。近有张紫葛《心香泪酒祭吴宓》一书，自称与吴先生为 38 年的生死之交，是书之作，乃为“以心香之诚，泪酒之悲，纪其实而存其真”，在封底更揭曰：“谨以此书祭奠吴宓，祭奠千千万万在中国史无前例的文革劫中，含愤忍冤殒沉的莘莘学者书生；并祈愿，哀恸不再，灾患不再，悲剧不再。”果如此，则其用心立志可谓光明正大，宜乎受到世人的欢迎了。此书确实也曾一度得到不明真相的读者欢迎。以陈吴两先生之一世深交，以两先生之思想与共，以两先生之道德高尚，以两先生之学术覃深，两部据实记述二先生之作，应该可成双璧。然而，细审之下，大谬不然。陆书言必有据，信而可征，根据大量档案资料、文字记载和访问笔录，写出了真实，写出了真实可信的陈先生及其时代背景。张书则多向壁虚造，穿凿附会，虚构了一个吴先生，乃成对吴先生之诬，对吴先生道德人品之诬。虽假托至交，编飭成书，可以欺不明真相之读者于一时，毕竟不能得遂其志于永久。此所谓“君子可欺以其方，难罔以非其道”也。吴先生乃方正之君子，在世之时，以其方而时为人所欺，想不到逝世十九年之后，竟亦为人织造了一个颠倒了的形象。但是，罔其非道，则万万不能，虽不能起吴先生于地下而辩之，吴先生的友人仍在，吴先生的学生还在，学界人士爱吴先生尊吴先生者多多，辨别是非真伪，大义所在。忝为吴先生弟子，此文之作乃为辩诬。其已见于季石《〈心香泪酒祭吴宓〉质疑》（1997 年 5 月 29

日文汇报《笔会》者，不赘。

《吴宓日记》无张紫葛三字

吴先生一生写《日记》不辍，这已是学界所共知。与吴先生熟悉的朋友，看过吴先生《日记》的人更知道，凡与吴先生有交往的人，即使一面之缘，吴先生也在《日记》中记上姓名及因何得见。数年前，吴先生女公子学昭整理先生《日记》，即告我写一简介以作《日记》注解，说是《日记》中写及我。所知，在上海同时被通知写简介者，尚有同学多人。我们这些同学，当年都读了吴先生的教课，男同学且与吴先生同住在男生宿舍，接触不算是很少，吴先生笔而记之，犹可说。友人王勉，是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毕业的学生，在联大读书时未选读吴先生教的课程，只是一次日机空袭昆明，在防空洞中与吴先生相遇，交谈数语而已，昨日晤王君，说是也曾得通知写一简介，以备《日记》之注。可见吴先生《日记》不漏相识之语不虚。张紫葛先生自称与吴先生为三十八年的生死之交，何以在先生《日记》中不见半点踪影？张紫葛为此在书内精心编造了一个吴先生“改造日记”的神话，说是吴先生为了保护这位生死之交，把凡是涉及张紫葛的，全都改造了。不是简单地抹掉，而是彻底地改造，剪裁，重写，装订，等等，一看之下，竟是“天衣无缝”。此等神话，徒令细读《吴宓日记》的季石厥倒，季石《质疑》之文详述其事，人当服其文之可信。《吴宓日记》只此一份，皆如先生在世所写原样，将陆续出版，国人得而共读，张紫葛为此不经之说，勿乃欺人欺世太甚。

带着 4000 册书逃难！

张紫葛在书中《后记》（页 455）有一段话：“至抗战前夕，他（指吴先生）的私人藏书已逾（按原文误为愈）万册。其中不

少珍版善本。南下赴长沙时，他选带了 4000 本之谱，其余均寄存在北京亲戚家中。经过长沙南逃，过香港，转云南，所带图书少有损失（振常按，不知是否为稍有损失之误）。于 1939 年挑了 1000 余册赠给了西南联大图书馆。1944 年至成都，鉴于内迁的燕京大学图书严重不足，他又挑了千余册赠给燕京大学图书馆。”

按，吴先生于 1937 年 11 月 7 日偕毛子水等离平赴津，乘船至青岛，登胶济火车，到汉口，又换乘粤汉火车，走走停停，于 11 月 19 日到长沙（据吴学昭《吴宓与陈寅恪》）。路上行程共 12 天。以一文弱书生（加上陪行的几位）竟能在交通困难、旅途拥塞的抗日战争中，携带着 4000 册书的重负长途跋涉，真是不可想象的事。张紫葛先生是经历过抗日战争的，他自己能相信吗？

吴先生到成都燕京大学之时，我正就读于燕大，未曾听说先生向燕大图书馆赠书的事。那时我们图书馆的书，的确少得可怜，小小一间书库，大约千余本而已。图书馆主任是梁启超的女公子梁思庄女士，同学和梁女士都常埋怨书少。如果吴先生一下赠书千余册，是件大事，会传开来的。张书中没有提吴先生赠送的千余册书是自己从昆明带到成都，还是后来托运到成都的。按吴先生于 1944 年 8 月 23 日自昆明出发，经贵阳、遵义、重庆、白沙到成都，于 10 月 26 日傍晚到达成都，时已在湘桂大撤退之后，入抗战后期，交通情况更坏，所以吴先生行程竟长达两月之久，自更不可能带着 1000 多本书经此长行。为张紫葛解，好在他没有说吴先生是亲带千余册书同来的。吴先生和我们同住在华阳县文庙的男生宿舍，犹忆吴先生只身一人住一小屋，行李简单，书籍无多，孤灯如豆，极为凄凉。

此题所谈是极小的小事，虽极小之事亦作伪，大事如何，可知矣。

关于朱小姐

张书（页 269 至 275）讲了一段所谓朱小姐偕其兄于 1953 年

4月自天津远道来重庆探望吴先生的事。抗日战争开始之前，朱小姐在北平女子文理学院读书，吴先生在此校兼课，朱小姐是吴先生的学生。吴先生由北平南下，由朱小姐陪同至天津。又由朱小姐的兄长陪吴先生南下至长沙。据张书所述，朱氏兄妹此时忽来重庆，实因朱小姐在北平时就爱上了吴先生，此来欲圆旧梦。到渝后，才知吴先生已经和邹兰芳结婚，乃向张紫葛吐露衷曲，悻悻而去。张书此前写到吴先生“改造日记”事谓：“1937年冬离开北平一节，删去了朱小姐等平大女生掩护吴宓由平逃津；也就一并删除了朱小姐的哥哥陪送至长沙情节。理由：如此情节留于日记中，也被认为汝吴宓处处惹草拈花，实为一‘道德败坏之徒’。”（页147）

按，季石所写对张书的《质疑》，谈到张紫葛所谓吴先生删去有关朱小姐情节，季石文发表在《笔会》时此节被删，兹引录季石原稿如下：

事实上，吴先生现存日记里详细记述了抗战开始时离北平南下的经过。如果真有朱小姐随行，也实不必删。因为吴先生当日照护同行一路到长沙的女生不是一个，而是三个，其中有陈援庵先生的女儿陈蕙，却没有朱小姐，也没有她的哥哥。当年是如何动身的，路经哪里，乘车乘船都发生了什么事，吴宓日记里可说是巨细无遗。当年的随行者，如今健康、清明如昔，历史岂是可以乱改的。至于朱小姐，确是在北平时吴先生的学生，与她的交往，在现存吴宓日记中也记得很具体。而吴先生日记所记与女性学生或女性友人的交往很多，也往往坦率记录自己对她的观感和想法。这些内容都完整保存，当然也无必要单单删除有关与某一女学生来往的记录，何况日记中有关朱女士的内容历历俱在，并没有删除。

不知仲旗公之名

张书自称在认识吴先生之前，先认识了吴先生尊翁仲旗公（按仲旗公为吴先生叔父。吴先生幼年奉祖母命，嗣与仲旗公为子，称仲旗公为父、嗣父，称自己父亲为爹。先生终生敬事仲旗公，情过骨肉），他是奉了仲旗公之命与吴先生订交的。张书详记经过说，1939年他在重庆，时去于右任家或衙署，“彼时，我见于府有一位老年常客，很受于公尊敬。这就是于公尊称为‘吴公’或‘仲旗公’的贵客。”“既然我们都是于府常客，自不免互相交谈。吴公熟悉经史，尤爱春秋三传，我更少年意气，喜纵谈诸子百家之说，因而一老一少，颇为投机。”一天，仲旗公问张知道吴宓否？方知仲旗公和吴先生是父子关系，即对仲旗公表示早已敬仰吴先生，愿为吴先生弟子，请仲旗公为之介绍。仲旗公表示愿介绍他们做朋友。“大约是1939年8月初旬的一天上午，”张紫葛应于右任电话召去于府，得见仲旗公偕吴先生在座。仲旗公对吴先生和张说：“希望你们做个兄弟般的朋友。”张表示愿对吴先生执弟子礼，吴先生则以为张是宋美龄的秘书而“不敢高攀”。“吴老太爷颇为不悦：‘你怎么说这些生分话？我斟酌久之，才给你们慎重介绍。岂可说出这些市俗客套话。’”于右伯拣出张的两篇文章给吴先生看，又说张是“后生可畏”，“将来未可限量”。吴先生当场看了文章两遍，说是“很有梁任公行文之妙”。“吴宓就表示，很愿和我切磋学问。但一定要遵父命，作朋友。”张则坚持师事吴先生，还是经于右任一番开导，“就这样，我们订了异姓手足般的忘年之交。”

不惮辞费，引述张书，凡未读张书者，当亦从此段引述得见张紫葛说来似是确切可信了。事实并不然，季石《质疑》文已证，检索吴先生《日记》，不但张书所指之“1939年吴仲旗先生却根本不在重庆，而是在陕西西安。”又证：“事实上，吴仲旗先生在其一生中始终就没有到过重庆。”而张书所谓识吴先生之

1939年8月初旬，季石列举吴先生在昆明正忙于所办的各种事务，亦无缘得去重庆。则张紫葛绘声绘色描述的与吴先生在重庆于府订交之事，只能是完全落空了。

事情更有读者所不可能想到的一面，张书既称屡见仲旗公，“一老一少，颇为投机”，仲旗公并为他介绍吴先生“做兄弟般的朋友”，怎么会在他自称“写成《吴宓的第三个28年》（振常按，当即为《心香泪酒祭吴宓》之原拟名），已洽妥，即将出版”之际，于1995年12月3日写信给吴先生幼女学昭，说是“专函请你协助两事”，两事之第一事为“校正我记忆未清的几点”。其第一点，赫然写着：“你祖父和两位姐姐的名字。”天下事的怪异还有过于此的吗？对于这么一位屡见的“颇为投机”的长者，且是生死之交的至友的父亲，竟然不知其名？说是一时记不起来了。张先生在他的《在宋美龄身边的日子》一书中，不是以他的惊人记忆力自负吗？且自述所以受宋美龄赏识并得为宋的机要秘书，即由于他的惊人记忆力而起。在这本《心香泪酒祭吴宓》的《后记》中，不是也说他的记忆力绝对可靠，所记“绝对准确”吗？此事有待于张紫葛先生指教。

《观且感》真相

据张书所述，吴先生于1956年给他看了行狂从1956年6月24日至1956年10月4日所写札记一册，共30则不到。张自称印象最深的是两则，一则题《苟不教，性乃迁》，藉为J女生补习古文事，阐发有教无类思想。一则题《观且感》，述吴先生于1956年9月30日晚参加中共重庆市委国庆招待会及10月1日参加国庆观礼情况。（张书页310至321）

张文详述《观且感》的内容及吴先生的感想。张文写得有声有色，长达4页，谓吴先生于9月30日下午乘市里派来的专车，自北碚乘车入城。“市委的国庆招待会，富丽堂皇。陈设华贵，宴饌丰美。宴席连绵，琳琅满目。首尾宴桌之间，遥远难辨人

貌。济济多士，其盛大有似欧美之国宴。……一省辖市之国庆招待会都有如此规模，亦可概见今日中华繁荣之一般矣。”“宴罢，接以盛大的舞会。……场内如云之美女，衣履华丽美艳。有短裙半袜，亦有窄裙袒胸，花色繁多，争奇斗媚，却是绝无蓝色干部服。且伊等大多施粉着脂，香气四溢，余乃大为快慰。”当晚宿市委第一招待所，“甲级房间，衾枕清洁。”次日，乘车至市中心解放碑观礼，又是大篇描写，大段感想，无非夸游行队伍之雄壮，堂堂中华之气象万千。且勿论孤怀卓犖、忧道忧世之吴先生能为此庸俗不堪之文，表现出如斯受宠若惊之状态与否，从事实看，1956年中共重庆市委的国庆招待会、重庆市国庆游行，都只是张紫葛先生的虚构，吴先生参加而发抒感想之说，更是张先生的想象。

今据吴先生《日记》，1956年9月30日是星期天，先生整天没有进城。没有什么人送来请柬，自没有什么入城参加国庆招待会的事，而是在学校宿舍内“终日整理书物函稿”，“至深夜始寝”。10月1日先生倒是去参加了国庆庆祝会的，但不是在市里，而是在北碚区，规模并不盛大，如先生10月1日《日记》所述：“今年国庆节之庆祝游行，一切从简。”所以没有什么招待宴会，也没有所谓的吴先生“登观礼台”，而是：“宓今日携绿帆布铁架义凳（又俗名马乍子），在会场得安坐，免席地。”这一天的《日记》又记着：“晴，热。国庆节。晨7：30在操场集合，宓偕豫往。入队，与史地系平、陶及吕烈卿（外文系）同列，随校队至北碚体育场。9：00开会，11：00毕。从平劝，宓与豫、陶径归，未参加游行。比宓等正午归抵校，游行队亦已散归矣。”

事实就是这样明白。张紫葛公然作伪。他为什么要作伪？看他书中写1956年前后的吴先生，简直活跃已极，对形势极为乐观，屡作“拥护”、“高呼”之谈，尽是趋时媚世之调，甚至于平生不祝酒的吴先生，也高呼“为……而干杯”。（按，张书杜撰吴先生在宴席上吃醋而不喝酒之说，实则吴先生是喝酒的。）《观且感》只是其一。1956年前后，阶级斗争的调子唱得少一些，形

势呈现缓和，确有不少知识分子为之欢呼，吴先生却不是这样的人，他始终是个远离政治的学者，头脑冷静如初，厌恶政治如初，坚持维护中华文化如初。《观且感》的思想，不符合于吴先生。不多举，只引《观且感》中一句：“今社会主义改造业已完成，实应举国上下，万众奋发，致力于科学技术之精进，力求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之突飞猛进。”这就完全不符吴先生的思想。吴先生诚然赞成和拥护要搞经济建设，但自1919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初识陈寅恪先生，多次倾谈，即得共识：“而救国经世，尤必以精神之学问（谓形而上之学）为根基。”“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，专谋以功利机械之输入，而不图精神之救药，势必至于人欲横流，道义沦丧。”（吴学昭：《吴宓与陈寅恪》，页9至10）是以先生一生服膺中华优良文化，维护中华优良文化，舍文化而言科学技术与经济建设，非先生之意也。张紫葛自称与吴先生有深交，竟全然不顾吴先生一贯的思想，做此伪托，胆可谓大矣。

张紫葛确实胆大，大到可以公然搬出一个死人来做他的老师。请看下节。

死人被没有出生的人！

张紫葛记他经张季鸾推许，拜见于右任。其书第三页这样写着：

于右任问及我的家庭和求学经过，叹为苦儿困学。复问师承，我答：曾拜门于清进士吴之英先生。于右任知道吴之英师与章太炎同窗于清儒俞樾的“春在堂”，盛赞吴师道德文章。又问先师授我何业，执何经。

我简单回答了几句，说：“我拜门时先师年事已高，精力很差，尤其我少不更事，因此学无根底，有玷先师门墙。”

以上所举，已经超越神话，只可于侯宝林的相声《关公战秦